



# 君子周而不比

□ 王 蒙

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是说亲和、合群、周到、周全、圆满;“比”,是说朋比为奸、利益勾结、一种狭隘性劣根性破坏性。

最初出自庄子名言“谓贤者之交谊,平淡如水,不尚虚华”,就是说贤良之人相互交往,不追求虚张声势、华而不实,而是像水一样纯洁自然,无色无味。后来形成民间谚语:“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也很生动有趣。君子——受过良好教育与讲究品德高尚的人,相互交往,不追求个人关系的亲密热络,而是道义理念之交,是讲原则可以相互提意见提批评的诤友,是交流学问道德文章的精神同道。而小人的利益互相输送,甜言蜜语,吹牛拍马,反而表面上热乎如甜酒之芳香醉人。

当然,庄子有庄子的一切

看透、类似超前“后现代”的把世界看成一个平面的所谓“齐是非、同善恶”特点,他体会不到理念与追求一致的同志间的火热深情。

还是孔子说得更准确,“周”,是大义、大局、全面,是五湖四海、统筹兼顾、胸怀阔大、目光高远,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朋“比”,是私情私利、山头帮派、小圈子、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浅薄自私、恶劣丑陋。

老子也讲得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没有个人成见偏见,处处考虑民心民瘼民利民意,这也就是周而不比。

周与比相较,是非、高下、明暗、荣辱,本来是分明立见的,为什么小人即平庸低俗之人偏偏不要周,而只要比呢?

第一,小人没有理想信念、真才实学,更没有道德情操、使命责任,又没有威信影响,却又斤斤计较、经营盘算,逐利求肥、怨天尤人。他们只能是因人成事、勾结串通、制造假象、混水摸鱼。

第二,小人的特点是嫉贤妒能,排挤人才,自身不够尺寸,却又不事学习,不求进步,不接受新鲜事物,不修身,不是见贤思齐,而是见贤思毁。自己既然乏善可陈,只能靠别人尤其是显然比他强的人受挫不顺,甚至是唯有靠成功者胜利者的倒霉来安慰自己。小人浅薄一些,本来不算大恶,一加上嫉妒,与人为恶,不顾大局,就是古人所说的“奸佞”了。

第三,小人中不相信美德,也不相信才具,不相信事业,也不相信公心。小人对于一切成败利钝、发展变局、兴衰通塞,都是用最卑下低俗的眼光看待解读的,他们看得见传播出去的,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他们相信的唯有朋比为奸,利益输送,绝对不相信顾全大局,公而忘私。

还有小人中的拉拉扯扯、心口不一、造谣生事、抹黑中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不警惕之克服之清除之,不能不光明提升净化我们的境界心志、精神生态。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化部副部长)



## 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

□ 朱汉民



唐宋变革之际,儒家士大夫崛起并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他们不仅主导和推动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同时还希望在山水之间搭建一个以“书”为中心的院落,以承载自己的师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们将自己建立起来并苦心经营的新型文化教育机构叫做“书院”。

### (一)

在创办书院的热潮中,宋代士大夫群体总是特别强调,他们之所以要在官办的太学州学县学之外另办书院,是因为书院在教育理念、办学宗旨上不同于官学。这就是后来学术界、教育界肯定的“书院精神”。其实,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师道精神。从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体中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呼唤,就是在批判汉唐经师沉溺章句辞章之学时,强烈呼唤复兴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儒”本来就源于以教育为使命的“师儒”,孔子号召儒士应该“志于道”,其实就是强调士师与道结合的“师道”精神。孟子特别强调师道尊严,肯定儒者承担的是“尧舜之道”,故而赋予了“师”具有“道”的崇高使命与精神权威。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积极倡导复兴早期儒家“师道”,并希望以师道精神重登历史舞台。

宋代士大夫复兴儒学、重建儒学是从师道复兴开始的。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明复、石守道对推动师道复兴的重要贡献,他们三人开始中止“师道废久”的历史而重新开始使“学者有师”,肯定他们对宋学学统的创建之功。

可以发现,宋儒往往勉励自己应该“以师道自居”,他们对于“师道”的责任意识内涵丰富:一方面,宋儒主张“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出对帝王的教育,发展了宋代极有特色的经筵讲学;另一方面,宋儒“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对民间教化,故而大量创办书院。在宋代士大夫的积极入世活动中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一种师道精神的为政与为学,而特别体现在他们的书院教育中。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王阳明曾经有评论,他说:“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

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与师道主导下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之兴,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

### (二)

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体现在许多方面,而最为集中体现的是宋儒对书院宗旨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宋代以来,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儒家士大夫,总是将“道”的承担作为创办书院的基本宗旨和教育目标。《宋元学案》曾经记载一段重要的对话,文靖(杨时)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程)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程若庸非常明确地将书院的创办与师道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宋初开始,儒家士大夫开始倡导复兴以“师道”为思想旨趣的孔孟之道,后来还发展出以标榜“道学”“道统”为主流的新儒学思潮。他们倡导师道精神集中在民间书院,他们主导的书院是表达自己师道精神的最佳场所。

所以,一切立志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士大夫创办书院,总是会将创办书院的宗旨确立为“道”,弘扬宋代士大夫特别张扬的师道精神。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南宋乾淳“四君子”,他们都是通过创办书院而复兴师道,这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

### (三)

两宋时期那些有师道精神追求的士大夫,也是最有学术创新成就的宋学学者。如石介有非常明确“道学”目标的追求,他有着鲜明的传承和复兴儒家之道的道统意识,并且将此道统意识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他在应邀作《泰山书院记》中,就将道统传承与书院使命统一起来,他说:“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石介以书院教育承担儒家之道的传承,就是宋儒的师道精神。另外他还长期主持徂徕书院讲学,被学者称为“徂徕先生”。特别是南宋著名的朱熹闽学、张

栻湖湘学、陆氏象山学等主要理学学派,均在创办书院过程中明确以复兴先秦儒家之道为宗旨,其实就是将书院建设与师道精神结合起来。如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之所以积极创办书院,是与其传道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年间韩元吉撰《武夷精舍记》,表达了朱熹创办武夷精舍的宗旨,即希望解决秦汉以来师道不传的问题,以“自得”孔子之道。

又如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明确了修复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强调岳麓书院的宗旨与目的是传道济民,这也是不同于科举利禄、训诂辞章的师道之学的复兴。

陆九渊率弟子在江西创建了象山等诸多书院,其弟子袁甫在《象山书院记》中也明确指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袁燮在其撰写的《东湖书院记》中,进一步明确其师道的学派特点,他说:“虽然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何谓道?曰:吾心是也。”袁燮是陆九渊的著名弟子,他不仅仅强调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求道,同时进一步指出此道就是孔孟之道的“为己之学”“自得之学”,他认为此学只能够源于“吾心”。

### (四)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普遍将书院宗旨确立为“明道”,其实也是为了明确书院教育的核心、灵魂其实就是“师道”精神,它具体体现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书院的师道体现为儒家人文理想的实现。宋儒继承了早期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样宋儒的师道就不仅仅涉及学校师生的授受关系,而是紧密联系家国天下、万世太平的“天下之道”,启动王道理想实现的关键在“师”。由此带来书院师道精神的一系列特点:士大夫创办书院的根本目标既在于“道”,他们坚信最终会落实于“治”;书院传授的最重要内容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人文化成的“成人”。所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以儒家之道的价值体系为基本内容。《揭示》首先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育人的“五教之目”,又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书院教学的“为学之序”;还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学生人格教

育的“修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书院生徒的“接物之要”。可见,宋儒之所以会藐视辞章训诂之学,是因为他们坚信师道精神才真正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理想,恢复了《周礼》关于“师儒”应该是“以贤得民”“以道得民”的教育责任。宋儒期待的师道精神,就是努力通过书院教育,最终实现和谐家国与大同天下,建立合乎“道”的天下秩序。所以,书院精神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书院推崇以道修身的为己之学,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通过讲道、行道以完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书院精神还体现为一种知识理性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理性的文化,儒家强调“道”的价值信仰、经世实践必须建立在“学”的知识理性基础之上。所以,在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实践过程中,求道与求学应该是统一和相通的。所以,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绝不能排斥知识教育。宋代书院一直重视《四书》教育,而《论语》开篇即强调“学而时习之”,《大学》开篇即强调“格物致知”,《中庸》也特别强调“博学之”“道问学”,这些都是书院教育具有强烈学术精神的经典依据与思想源头。宋儒包恢在《盱山书院记》中说得极为透明:“夫以书院名是,所主在读书也……然予谓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患在人以虚文读书,而不以实理体道,遂致书自书,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离矣……况读书非为应举也,若其所读者徒以为取科第之媒,钓利禄之饵,则岂为贞志者哉。”宋代书院的知识追求十分迫切、学术精神十分强烈,但是书院教育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的。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知识学问的地方。以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天下的治理为核心的经史之学成为古代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宋代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宋代学术获得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转型和发展,不同学术思潮、不同学派形成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借助于师道精神而不断开拓和发展,师道精神凝聚成为书院学术创新的推动力,推动书院学术思想的不断更新。

(作者系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 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

□ 王胜章

大学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目标。全周期管理意识强调,要用系统集成思维来解决治理问题,从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的角度,统一理念、目标、组织、规则,形成系统协调完备的治理体系。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把握高校治理工作规律,努力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建设。

明晰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目的。全周期管理理念所秉持的生命有机体思想要求我们在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只见物不见人。现代化的大学治理要把管理服务对象当作活生生的有机体,遵其内在规律为其提供人文关怀。一是从学生的需求出发,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改善学习生活环境,努力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二是促使教师快乐。教师既是大学治理的主体之一,也是大学治理的服务对象。大学之“大”,首在大师。大学治理者一定要懂得什么是优秀人才,以魄力和感召力招聘最优秀的教师人才,并提供体现其尊严的待遇,使他们工作生活

快乐。三是满足社会需要。要把准全球化时代大学发展的方向,把握社会对大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大学如何满足这些要求。要坚持“四个面向”,及时调整所办专业,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完善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方略。全周期管理强调的整体性推进、全要素管控、分层次治理、跨区域协同、全流程监督等,为大学治理提出了策略性要求。一是把局部性治理和全局性治理结合起来。既坚持整体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长期规划,又要坚持过程思维,把握大学治理的阶段性要求,推动阶段性任务的落细落小落实。二是从事物发生、发展的全周期出发,加强研判、增强预见,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对大学的校园安全、意识形态、教师队伍管理等问题,要集中资源力量高度重

视。三是把分层次治理与跨部门协同结合起来。针对学校、院系、直附属单位等多层次需求,针对教学、科研、管理、后勤等全过程和各环节精准施策,着力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同时,注重加强部门、院系等横向互动,打通传统治理体系“条块分割”格局,建立健全学校协同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四是把前期预防、中期执行、后期总结结合起来。针对招生、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后勤服务、大型活动等环节,坚持全过程管理,事前重在预防,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事中重在应对,做到反应迅速、处置有效;事后重在总结,做到妥善处理、汲取教训,并追责问责。

健全引领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要通过融通“大学之制”与“大学之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并在治理实践中补齐制度短板,提高制度执行能力。按照全周期管理理念,要从各个层次健全大学的制度体系:一是健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根本制度。这是事关大学治理最基础的制度安排,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重要制度体现。二是健全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制度。这是大学治理的规则与程序的制度安排,包括大学的决策制度、行政执行制度与学术管理制度等。三是健全以确保学校日常运转为目的的具体制度。这是大学治理具体行为与政策设计的制度规范,包括学生管理、经费管理、社团管理、安全管理等具体制度安排。做好制度衔接和分层对接,通过各层次制度的衔接和各领域具体制度的配套,使制度设计精准落地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用好助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工

具。用全周期管理理念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除了创新理念、选取策略之外,还必须选好工具、用好工具。一是善用科技手段。充分运用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建立完善超大规模大学风险大数据信息监测预警平台,实现信息采集的全面化、实时化、准确化,推动大学风险治理的智能化,探索建立智慧大学。二是善用法治手段。要强化依法治校,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大学治理顽症难题,让法治成为大学治理的有力武器。三是善用道德手段。大学应当是道德的高地、良心的堡垒。这既是对大学自身的定位,也为运用道德力量开展大学治理提供了重要条件。要持续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道德手段在大学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夯实关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全周期管理理念强调,治理目标的实现最终都依赖于基层组织的执行与落实。夯实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应坚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资源向基层倾斜。将治理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以实现末梢治理、精细治理、高效治理。二是培训基层干部。“全周期管理”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和要求,以及技术手段支持等都将有许多新的要求。因此要对大学基层干部进行系统培训,从理论上厘清“全周期管理意识”,针对大学治理的全周期管理的具体内容,建立相应操作性的制度和培训性的课程,通过培训使基层干部适应全周期管理对大学治理提出的新要求。三是涵养大学文化。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应积极培育优良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使之成为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肥沃土壤和强大力量。

